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的话语建构

郎慧慧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的话语建构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公众的共享意识,把中国共产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共享思想话语上升为普遍观念话语的过程。在对古今中外共享话语进行科学辨别与合理汲取的基础上形成的、与马克思主义共享话语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成为新时代中国应对国内外发展难题的话语选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是一个由价值导向、理论逻辑以及制度保障这三层结构构成的话语体系。面对话语建构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理论定型与实践转型以及对内与对外等多重话语张力,系统性、辩证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方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科学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的话语建构对于新形势下引领国内外社会舆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 话语建构; 机会共享; 利益共享; 全球共享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4-0012-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4.001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由分配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都是不可避免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中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两极分化严重、民生建设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落后等不公正发展的现状逐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影响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共享”话语在中国各领域广泛传播。特别是自共享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学界通过探讨其理论生成、基本内涵以及具体实践,初步形成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理论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学界对其研究集中体现为一种理论宣传式研究,大部分学者并未超出中央文件以及党的领导人对共享发展理念的阐释框架,而是不断地重复这一叙述空间,导致政策性文章多于学术性文章、应景式研究多于理论性阐释。共享思想话语内涵的单一性、封闭性和片面性直接造成该话语影响力的日渐衰弱。事实上,共享作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方法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话语,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体现为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持久的理论生命力。它的话语体系构建实质是在对传统自我认知的基础上用现代话语形式和内容对我国价值尺度进行重建的过程,既能有效消解西方对“中国威胁论”大肆渲染的消极影响,又有利于增强民族复兴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因而理应上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谬论的理论批判与实践应对”(AHSKQ2019D049)

作者简介: 郎慧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langhuijy@126.com (北京 100872)

的高度，以释放其内在效力。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基本样态

“共享”这一话语内涵丰富，是“语言和思想的综合体”。作为传递信息的语言符号系统和反映特定主体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思想，它在规范人们思维以及影响人们行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据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大致蕴含三种基本样态：由社会成员自觉选择的日常生活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话语以及追求普遍观念形式的学术话语。

（一）日常生活话语：共享概念话语

概念一般通过特定的符号或语词充当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交往和沟通中进行信息传递的工具或中介，是话语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基本单位。但是，并非所有概念都可以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日常生活话语。综合来看，它至少应具备两方面特征：一是受众广泛。概念不是发生于生活中的偶然现象，也不是以固定短语或词义在某一领域被使用。同一概念往往会出现于多种场合，或与不同领域的语词相结合而构成新概念，大众化趋向明显。二是共识性强。当比较零碎的概念作为主体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成为社会大多数所认同的共识话语，并影响和改变着交往行为主体的思想和实践，该概念就会由于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而更易于在人们生活中普遍传播，这是日常生活话语最基本的特征。

当今社会，资源使用、社会管理以及人际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共享”已成为企业、社会、民众和主流媒体等不同诉求主体的话语表达。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生，互联网充当着信息化社会的角色，其互联、协同的内在特征推动着交往工具的改进，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交往形式、互动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方式，使群体间对信息、资源的共享度大幅提升，这为“共享”的话语传播提供了客观前提。之后，“共享”概念在经济领域唱响，集中表现为企业主体对“共享经济”的话语表达，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汽车等共享闲置资源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大范围出现。经济领域的“共享”概念话语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它潜在影响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激发着社会领域共享公共设施和共享服务的兴起，诸如共享医疗教育、共享图书馆、共享员工、共享护士等。共享话语直接将目标聚焦于日常生活，使人们切实感受着共享的便利。这样，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共享”概念话语分别从生活模式和公共生活内外两个层面规范着消费者及其公众的思维结构，加之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与舆论引导，“共享”随之成为近几年在人民群众话语交流中最受青睐的概念话语。

（二）政治话语：共享思想话语

马克思曾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P533)]。这说明语言（即话语）与意识形态具有共时性和同构性。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话语还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将话语产生和运作过程中表现的意识形态功能总结为“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2](P159)]，从而话语就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隐形的强大权力，而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掌握话语权的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称为政治话语，指的是统治阶级在制定政策、制度、发展理念中使用的话语，其实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将其价值立场和观点渗透于一定的政治和制度中，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向人民群众进行传播和灌输。

政治话语的生成离不开日常生活这一孕育土壤，但日常生活话语若要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话语，不仅要与执政党的价值观和政治属性保持一致，还要经过统治阶级的理性认识，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这一维度看，日常实践中的共享概念话语内在蕴含的分享之意，不仅契合了社会

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而且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符合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而得以上升为党和国家政治话语的选择对象,并以共享思想的话语形式表征出来。纵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共富是共享的“元话语”,共享则是对共富的话语升华。从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3](P495)}概念,到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共同富裕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然而,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有计划、分阶段地达到,共享则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开启了对“如何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探索,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将“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4](P17)}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之后“共享”一词在与共同富裕、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种国家战略理念。直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共享发展理念真正作为一种“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被正式提出,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未来“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自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话语体系成为共享思想政治话语的中国样态。与此同时,共享思想话语的内涵在新时代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出现了诸如“获得感”“幸福感”“美好生活”“包容性发展”“普惠性发展”等关联性话语,而且还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表达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语则构成共享思想政治话语的世界样态。

(三) 学术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

学术话语是由特定概念组成并具有一定学理支撑的体系话语,其理论性和规范性的典型特征实现了对日常生活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更高层次综合。一方面,学术话语是对日常生活话语的“反哺”,它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主流话语或中心话语,并对其提炼升华,最终发展为一个能引导人们日常行为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学术话语必须坚守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底线,任何脱离政治话语的学术话语都会陷入学术话语编织的“理论陷阱”。由此,打造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必须“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5],推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辩证结合,让政治话语成为学术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术话语则通过发挥其理论支撑作用充当政治话语得以表达的承接载体。

作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既源于对日常生活中共享概念话语的本质提升,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共享思想话语的理论表达。它指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悠久文明的底蕴和深度,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话语。共享话语理论体系是这一学术话语的骨骼,它由共享话语概念组成,在特定共享话语环境中,通过一定风格的话语表达方式予以呈现。具体而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元话语”,即具有本质意义的核心概念,其他诸如“惠及”“公共”“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共享意义的话语都围绕“共享元话语”展开。共享话语语境的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生成赋予当下性,它对内实现了由“先富”与“后富”的先导性话语语境向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的自洽性话语语境转换;对外则由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话语语境转向中国主动重置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话语语境。若要扩大话语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就需促进表达方式的转换,如以“讲述故事”代替“政策宣传”,以“传承古今”代替“古今分离”,以“融通中外”代替“自我中心”,以“喜闻乐见”代替“枯燥无味”等。最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以系统而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呈现于大众面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作为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流话语,正逐渐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建构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认为,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双向互动是促进事物发生的双重语境,前

者为建构新事物提供基础性条件，后者则是促进新事物建构的直接动力。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与汲取、对马克思主义共享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国际经验教训的反思与镜鉴，而全球性共享发展问题和国内贫富分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则使这一话语建构具有了现实紧迫性。

（一）历史积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共享话语本质上说明的是一种财富占有与社会享有之间的关系话语，存在于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并在中西思想史中以不同历史样态表达。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基因和话语供给。

一方面，中国传统共享文化构成该话语的内源文化基因。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往往以特定的文化模式潜在影响着社会的心理结构和人们关照世界的思维方式。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生成同样深受中国传统共享文化的影响，是对具有共享意蕴的和合理念和大同理想的养分汲取。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本源以及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主张具有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协调差别和斗争、化解矛盾和冲突而达到新的融合，以此实现事物的和谐发展。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和谐关系，主张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以“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精神适度地开发自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追求中外相安、协和万邦，认为“国与国不相攻”（《墨子·兼爱上》），倡导通过平等的邦交原则实现不同邦族之间共享和谐；在社会领域，主张具有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精神的“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在差别中寻求同一、在多样中寻求共存的社会和谐关系。当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社会”等共享话语正是从和合理念中寻求文化基因的重要表现。同时，大同理想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其反映的美好愿景主要包括反对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和天下为公^{[6](P9-10)}，这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构建共产主义共享社会。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黏合作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构建具有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另一方面，西方正义理论构成该话语的外源话语供给。习近平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7](P18)}。正义理论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议题，是共享精神本质的直接聚焦。虽然它与真正的共享思想在前提、内涵和理论目的上都具有本质差别，但在西方思想史中得以丰富发展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正义话语确实可以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提供话语供给。古希腊时期，柏拉图首次按照正义理念设计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体现真善美统一的公正理想国，并制定了一套利于培养各阶层集体主义精神的、没有贫富之分的平均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亚里士多德倡导一种“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正义，认为正义是实现分配的公正和矫正的公正相统一的差别正义。近代哲学家也纷纷对“何为正义”进行深思和探寻，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重新肯定，到洛克提出“分权社会”，孟德斯鸠倡导“自由社会”，卢梭主张“契约社会”，他们都以抽象的人性为出发点，将人的权利作为政治秩序的产生基础，个人自由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等价物来探讨，其目的就是构建一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全体成员共同享有主权的理想社会或共同体，以此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现代以来，以理查德·阿内逊、约翰·罗尔斯、阿玛蒂亚·森、查尔斯·泰勒等为代表的学者从福利、资源、能力、共同体等视角探求正义的本质，虽然在可行性上还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制度鸿沟，但这些关于更高层次发展型共享的基本议题却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学理深度上发挥着话语供给的功能。

（二）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共享理论

话语是理论的符号性表达，理论是话语的内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理论架

构正是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科学公有共享观的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而构建的话语体系。

共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阶级对立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样态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53)}的“联合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其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P52)}。这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类发展的全民性。个人自由不再“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而是强调“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571)},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个性得到张扬,并全面、平等地享有权益。第二,个体能力发展的全面性。人具有“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189)},人的各方面的需求和相关福利在与他人的共享中不断被生产和满足,因而每个人都是自由发展的享有者与被享有者。第三,发展的全民性和全面性直接助推人的自由发展。在个体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发挥自己“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10](P417)},并可以根据自我需要从事工作,合理分配时间,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共享不仅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手段和桥梁,而且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社会特征,表达了人们对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消灭一切剥削压迫,构建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幸福理想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角构建了共享话语的理论架构。在马克思看来,共享的实现需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1](P538)}。他认为,在机器大工业的作用下,劳动和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事实”,这在促进生产集中化、大型化的同时,有利于提高社会产品生产能力。然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社会化推动的生产力提高“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11](P579)},这决定共享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被压制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9](P200)},这说明能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与共享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马克思通过考察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分离、再结合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一种比私有制更具优越性的新型社会占有方式,即个人所有制,以使劳动人民真正从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变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同时,在社会享有方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分配方式应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转变,其实质就是从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分配平等向消除事实分配不平等的真正正义的过渡。

概言之,社会生产、社会占有方式和社会享有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共享理论的三重维度,它们分别以社会主义生产话语、所有制话语和分配话语予以表达。这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生成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该话语的生成和构建提供了理论架构。

(三) 他山之鉴:国际经验与历史教训

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主题。围绕“何为发展”,西方发展理论实现了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全面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表征着西方社会对共享发展的追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下,西方很难找到一条真正共享之路,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公正问题。国外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形成的一些施政纲领或经验教训可为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提供镜鉴。

经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以下四个样本对创新我国共享思想话语有较为典型的参考价值。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贫富分化矛盾的经验教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危机的根源。为治理这些顽疾,加强政府干预、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大多数国家缓解底层贫穷与无辜困苦的基本选择,其中,在西方社会逐渐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最具特色。西方福利制度主要包含社会保险制度、社会补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内容涉及医

疗、卫生、教育、住房和保险等多方面的福利待遇，其本质是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存条件，培育现有以及未来工人的劳动力水平，扩大群众对个人消费品的需求。这虽然容易使国家陷入超越本国财力的“福利陷阱”，但它确实使工人阶级的生活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对缓和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在警惕“过度福利”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福利制度的合理成果，对我国实现社会转型、推动“福利共享”具有重大参照意义。

二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由世界银行首次提出并使用的概念，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障碍和困境，如贫富分化、居民消费不足、阶层矛盾突出、生态破坏、公共服务短缺、腐败多发、民主乱象加剧等。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顺利跨越这一陷阱，阿根廷、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就是国际公认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在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推进过程中一味复制原来的发展方式，忽视科技创新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发展，避而不见社会公平发展，进而严重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忽视社会发展成果均衡共享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同样是我国可能陷入这一陷阱的主要原因，因而在总结“拉美陷阱”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是共享话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是较不发达国家推动共享的可行性经验。古巴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发展缓慢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该国却是国际公认的“人民共享型”国家，它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福祉，从根本上改变不公正状态，保证人民的平等生活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然而，古巴社会公平思想带有平均主义的弊端，直接导致古巴经济发展缓慢。因此，如何建构有差别的公平话语才是创新中国共享思想话语的有益路径。

四是国际社会化解贫困的主要方案。在收入、能力和权利等方面出现的贫困问题是伴随单一发展模式而产生的全球性问题。相应地，国际社会选择一种包容性理念来化解这一挑战，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包容度或主体对其他主体在个体差异明显前提下的共存空间。据此，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关注到了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主张以过程包容性推动结果包容性，进而使民众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后，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发展”进一步将经济领域的包容性增长引申至社会各领域，将贫困问题提升到发展高度，致力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国际社会提出的包容性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走向，其中关于保障全体人民机会平等、着力解决绝对贫困、致力于使全体人民共同受益的思想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话语具有深刻启示。

（四）实践场域：国内外发展难题

“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2](P436)}，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建构同样离不开大的国际时代问题，以及民族国家的具体现实问题，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全球性危机要求国际社会寻求破局之道。全球化具有整合与分裂双重属性。整合体现为民族国家原有边界被弱化或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13](P18)}的相互融合特性；分裂由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造成，其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风险的加剧。一旦民族国家间分裂属性的消极影响大于整合的积极作用，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风险挑战就会大于发展机遇。伴随互联网在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上的突破性成就，全球化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更加密切。然而，全球化风险同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正逐渐超过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成果，并有持续延伸的趋势。法国著名政论家、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当今世界正在或可能将遭遇人口爆炸、老龄化、资源枯竭、气候危机、科技威胁、疫病与战争等全球性危机。若仍然找不到破局之道，它们有可能会毁掉人类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由此，他认为未来我们只有转变价值观念，实现

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范式转变”，以全人类联合起来的方式，才能共同创造并享受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14]。事实上，这充分说明共同联合、共享发展才是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可行方案，而这与中国所倡导的以共享为价值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不谋而合。

同时，国内贫富分化和民生滞后问题的激化倒逼“共享”话语。习近平指出，当前“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民生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15]，这反向说明贫富分化与民生滞后矛盾的尖锐化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大局。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据考察，全国收入差距自2008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小幅缩小趋势，但却在2016年以来出现缓慢的上升，且基尼系数长期在高于国际警戒线之上的0.46~0.47之间徘徊。另一方面，民生滞后问题凸显，这是经济与社会不均衡发展的直接后果。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部分低收入群众、绝对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是当前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民生问题；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得不到充分保障。究其原因，贫富分化和民生滞后的激化与难以打破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在各领域长期实行的“先富”“后富”等不均衡战略政策、未能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应有效用等不合理性因素密切相关，直接导致一些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很难更多分享民主政治发展成果和精神文明发展成果”^[16]。伴随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它们必然与人民群众自身的公平偏好相背离，进而加重社会各阶层成员的不满情绪。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一种内蕴公平价值的“共享”话语在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及其建构思维

体系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或意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包括价值导向、理论逻辑以及制度保障三层结构，对其建构离不开一定思维方法的引导。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体系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是价值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话语的价值性指的是话语价值观的指向意义，它在赋予人们具体价值取向的过程中，能够“引发我们的赋予意义的行为”^{[17](P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的价值属性体现在共享规定了最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方向和要求，并引导社会各领域改革走向一种“善”和“正义”，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与发展。在共享价值的引领下，中国在社会各领域出现了诸如“共享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发展”“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等经济正义话语；“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政治正义话语；“文化交流互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民健身”等文化共享话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共享话语；“合作共享”“共建共享社会治理”“补齐民生短板”等社会共享话语；“一带一路”“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等全球共享话语。可以发现，共享价值以实现全体人民幸福为根本归宿，以“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民话语为话语核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价值支撑。

话语的科学性体现在话语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和“理之有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是包括前提性共享、过程性共享和结果性共享在内的话语逻辑体系。具体而言，第一，机会平等话语是前提性共享的首要表现，主张全体社会成员无论政治经济地位高低都能通过平等竞争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面对社会成员机会不平等现象，习近平特别注重教育机会的平等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机会，明确提出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8](P235)}。第二，过程性共享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规则公平。这是保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19](P811)}的共建制度话语，是使每一个人的劳动共享权利得到充分尊重、自由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正规则话语，是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表达、协商、协调的利益疏通机制话语。第三，结果性共享话语是指向利益共享的话语。利益共享不但包含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方位发展成果的公平享有，还特别注重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全民享有。对此，习近平多次使用“更”“最”“也”等程度性或比较性名词来表达人民群众的这种需求，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等，并在不同场合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20](P4)}，要“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21]。可以说，这些致力于民生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新话语，最大程度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原生性和内生性。

话语的实践性注重通过制度话语保障话语内容的实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22](P225)}，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度都符合共享的制度属性要求。当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包括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前者由于维护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利益而与共享发展所依存的“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诉求相背离，后者则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对立和差别为价值取向，因而“对发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的认同更为强烈”^[23]。从这一视角看，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制度话语作为共享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共享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真正体现。长期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分好蛋糕”“兼顾效率与公平”“共同劳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等制度话语，它们在创新性发展中保障共享的渐进实现。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思维方法

所谓话语建构方法，是指话语建构者以一定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在话语建构过程中为达到建构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或技巧。合理的话语建构方法能起到提升话语影响效力的作用。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复杂的社会机理，离不开历史性、现实性、理论性等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是，该“话语体系”又是一个内含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若要实现其内部结构的和谐贯通，必然需要处理诸多内部矛盾，如传统与现代、理论定型与实践转型以及对内与对外等多重话语张力。从这一语境看，系统性、辩证性、开放性的思维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就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系统思维是一种以思维对象为基础，从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上认识事物整体效应的思维方法。正如 E. 拉兹洛指出，系统观点就是要“构成拥有它们自己的性质和关系集成的集合体，按照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事件来思考”^{[24](P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首先是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理论逻辑、作用机制构成的纵横交叉的共存系统，它们在社会整体发展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在宏观层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属性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方向，共享的价值属性引领着国家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在中观层面，“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共享话语运行模式反映了该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微观层面，人民群众在共享中切实享受到的福利则是共享思想话语建构的直接目的。由于任何一个结构系统的单独作用或结构系统间的相互割裂都会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甚至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因而运用系统思维均衡话语体系内部各层次的张力，对于整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意义重大。

不同于形而上学式零散地、片面地和孤立地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思维是一种历史、辩证、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法。它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建构中存在的主观化、极端化的思维倾向，还能帮助我们有效化解话语建构中出现的各种错位现象，并使之在合理

张力中相互制衡。一方面,用批判性思维处理传统共享话语与现代共享话语之间的张力。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共享话语作为中国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精髓,并非单纯是现代共享思想话语的历史流传物,而是可以帮助现代共享话语选择最为合适的话语内涵和价值理念的话语形式。现代共享话语则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其理论架构随实践的发展而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对传统共享话语不能简单实施“拿来主义”,而应以一种批判性思维实现传统共享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丰富现代共享话语的内涵。另一方面,用结构与过程的辩证思维处理话语逻辑定型与实践转型之间的张力。作为一种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一旦建构就具有确定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却具有时代性,它的内容会随社会实践的转型而发生变化,这必然会与定型的共享话语体系发生冲突。因此,转型与定型的张力,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结构出发,根据社会变革与调整来建构体系、丰富体系和创新体系,以此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持久活力和生命力。

开放思维突破了单一、狭隘的思维定势,重视多视角、全方位、多元化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当今时代是开放、交融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体系的生成离不开国内外环境的互动互制,其理论话语构建也必然包含如何以共享思想引领对外开放的对外话语,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球共享话语。具体来看,全球共享话语是以“和合”理念、“天下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传承,以新中国长期形成的外交理念为前提条件,由“和谐相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概念话语,共同价值观、新安全观、文明观、新型大国关系等新理念话语,“命运共同体”等“新世界主义”话语,“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政治实践话语共同构成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由国内向国外实现空间转向的结果。但是,面向主体和实践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在中西、内外双重语境下的话语张力,我们必须发挥开放思维的包容特质,通过协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和外在表现开展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共享话语场域的交流合作,以此实现中西、内外话语张力的弥合。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7](P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思想话语正是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的纵贯古今、融通内外的中国话语。它的建构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崛起,并同步推进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可起到对内引领社会舆论和塑造良好社会政治心态、对外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影响国际舆论的作用^[25],并为提升民族话语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认同感提供话语支撑。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1).
- [6] 陈正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14][法]雅克·阿塔利.未来十五年[M].赵斌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15]习近平.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民生仍是中国第一要务[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politics/2013-11/03/content_30481078.htm,2013-11-03.
- [16]李红松.共享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与落实路径[J].求是,2016(9).
- [17][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1]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4-3-22(1).
- [22][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 [23]韩喜平.整体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四个向度[J].社会科学家,2016(12).
- [24][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科学新发展的自然哲学[M].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5]何毅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话语的崛起[N].学习时报,2019-09-27(01).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Sharing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ANG Hui-hui

Abstract: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shar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shared thought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upgraded to a universal concept discourse according to the public's sharing consciousness in daily life.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and reasonable absorption of shared discourse at all tim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discourse of the shared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n line with that of Marxism, and has become the discourse choice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discourse of shar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discourse system composed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system guarantee. In the face of the multiple discourse tens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oretical stereotypes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course tension, the systematic, dialectical and open thinking methods play a more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shar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eading public opinion at home and abroa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overeign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 words: sharing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pportunity sharing; benefit sharing; global sharing

(责任编辑 孙 洁)